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以浙江民营金融发展为例

史 晋 川¹ , 严 谷 军²

(1. 浙江大学 经济系 ,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 金融系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民营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浙江当地经济的市场深化所引致的结果 , 目前其已成长为浙江金融界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 并对金融深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民营金融的良性发展 , 需要解除对民营金融的压制 , 为其创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 民营金融 , 金融深化 , 民营经济 , 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 F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1) 06 - 0070 - 07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manag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SHI Jin-chuan¹ , YAN Gu-jun²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

2. Department of Financ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manag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market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Zhejiang financial sector and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province. To enabl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ose privately-own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it seem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remove suppressive measures so as to create a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growth.

Key words : privately-manag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改革后 , 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较早起步 ,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显著地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而在金融领域 , 浙江省亦开始形成一个与其他省份横向比较而言较为发达的民营金融部门。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 , 民营金融在政府的管制与国有金融部门先入为主占据垄断优势的双重挤压下艰难地成长着 , 但却日益发挥出独特的功能作用并显现强烈的发展动机。为此 , 剖析浙江民营金融的生成机理 , 从制度层面探寻使其步入规范、快速发展轨道的规则安排 , 对于金融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营金融的规模、分布与特征

民营金融 , 可以界定为由除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以外的金融机构 , 也即民营金融机构所

[收稿日期] 2001 - 07 -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0BJY109

[作者简介] 1. 史晋川(1957 -) , 男 , 山西武乡人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2. 严谷军(1970 -) , 男 , 浙江上虞人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 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具体来说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家不控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铺以及名目繁多的互助储金会、资金服务部、金融服务社等等。

在浙江省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后伴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壮大 ,目前在存贷款规模、机构网点、员工数量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998 年末时 ,全省有 101 家城市信用社 ,存款余额 161.65 亿元 ,贷款余额 101.34 亿元 ,从业人员 5313 人 ,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和从业人员的 3.05%、2.6% 和 4.10%^①。1996 年至 1998 年期间 ,全省有 7 个地级城市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 ,截止到 1999 年 6 月末 ,共有营业机构 427 个 ,员工 5719 人 ,资产 267.27 亿元(其中贷款 153.43 亿元) ,负债 255.91 亿元(其中存款 224.37 亿元) ;1998 年末 ,全省共有 1274 个农村信用社 ,82 个农村信用联社 ,各项存款 956.14 亿元 ,各项贷款 697.95 亿元 ,职工人数 3 万余人 ,分别占全省金融业的 18.2%、17.9% 和 26% ,其中在员工人数上位居全省金融机构中的首位。仅就前述三类机构的加总情况来看 ,其存贷款数量均已占全省市场份额的约四分之一 ,员工数量则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见 ,民营金融业已成长为浙江金融界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而在某些区域经济中甚至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如在台州市路桥区 ,以城信社为主体的民营金融业的实力已大大超过了当地的四大国有银行(见表 1)。

表 1 台州路桥区国有银行与城信社存贷份额比较(1999 年末)

项 目 机构类别	各 项 存 款		各 项 贷 款	
	余额(万元)	比重(%)	余额(万元)	比重(%)
金融机构总和	724493	100	413100	100
工商银行	66538	9.2	39192	9.2
农业银行	93907	12.9	45338	11
中国银行	36694	5.1	18078	4.1
建设银行	78018	10.7	29518	7.1
城市信用社	289577	40	183112	44.3
其中:银座城信社	153658	21.2	100200	24.3
泰隆城信社	114468	15.8	61301	14.8

从横向上来比较 ,浙江民营金融业的比重明显地超过其他地区。如上所述 ,1998 年时城信社等民营金融机构已占据了浙江全省 1/4 的存贷款份额(具体数字分别为 25.2% 和 24.1%) ,而全国同类机构则仅占有 19.1% 和 14.1% 的存贷款市场份额 ,浙江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在全国农信社系统中 ,浙江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额均位居前三位 ,从近年来的运作绩效方面考察 ,浙江的城信社、农信社等民营金融机构总体而言在全国同样处于十分显著的领先地位。

从股权结构上来看 ,民营金融机构一般由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农户等入股组成。与其他地区相比 ,浙江相当数量的民营金融机构尤其是城市信用社从建立之始就表现出具有较明晰的产权结构。但在合并城信社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过程中 ,大都采取了财政控股的做法(财政持股近 30%) ,从而改变了这些机构原先的民营性质 ,导致其内在的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出现弱化趋势[1] pp.48 - 49)。

在地域分布上 ,浙江的民营金融机构主要分布于个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二者之间呈现出强烈的正向对应关系。以城市信用社为例 ,1998 年时 ,在素以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温州、台州两市

① 文中数据除特别注明外 ,系根据《浙江金融年鉴》及其他有关资料整理计算而得。

就共有41家城信社,占全省总数超过40%。在金融服务功能的定位方面,民营金融机构主要为个私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农业以及个人等部门提供服务。如台州市的银座城信社和泰隆城信社,除极少部分贷款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建设外,90%以上投向了以个私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成分。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浙江的民营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已形成较强实力,但就个体而言,则仍具有家数多、单个机构规模小的特点。1998年时,平均每家城信社的存款额仅1.6亿元,贷款额仅1.0亿元。农信社则更是如此。较小的经营规模和资产实力,必然导致其对风险的承受力较弱。就目前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而言,浙江民营金融机构主要仍只从事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部分也有结算功能和开展银行卡业务,但结算渠道不畅,异地结算困难重重。票据承兑贴现、国债投资、国际结算等属于新增长点的业务往往不允许从事,致使其服务功能和业务种类与国有银行相比不很完善。在经营地域上除极少数经批准可在属地之外延伸分支机构外,其营业网点和经营范围局限于本地,尚难跨区域发展。上述金融业务的受制,影响了规范的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使其在日趋激烈的金融同业竞争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二、民营金融与民营经济的互动

1978年以来,浙江率先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革为其自身构筑了一种较之于其他地区十分明显的“体制落差”优势,引发了个私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全省各地兴起了一个日趋庞大的民营经济部门。

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要求金融结构的相应发展与其相适应。以民营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个私中小企业作为企业结构主体的经济格局,内生决定了个体工商户、个私企业等经济主体对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必然提出强劲的需求。作为当时先于民营经济的兴起而存在并占据金融市场绝对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坚持的是“惟成分论”,民营经济不可能享受向国有银行融资的便利,其通过国有银行获取外源融资的渠道是梗塞的。

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使没有制度方面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人为限制和歧视,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也是存在着明显的障碍的。这是因为:首先,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相比,个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额小、面广、期限短、随机性大等特点,从金融机构收益的角度看,上述贷款需求特点导致了对其信贷管理的成本较高,收益较低。道理很简单,金融机构经营一笔贷款业务往往要支付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当一笔贷款的额度较小时,其分担的固定成本相对就大,金融机构从中获利就小。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放一笔贷款的费用支出甚至是与贷款数额大小无关的。作为大型金融机构的国有银行,其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运作成本。由此,因自身规模因素而适宜于对大行业、大企业开展“批发信贷”和进行集约经营的国有银行,很难适应浙江民营经济兴起过程中的特定的融资需求。在已形成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求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受比较利益驱动,国有银行也就相对缺乏对为数众多的工商户和个私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其次,对于长期与国有企业打交道的国有银行来说,兴起不久的非国有中小企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不为其所熟悉,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较严重的。而信息是银行贷款决策的基础,如果未能掌握充分准确的信息,也就意味着银行贷款的风险是极其巨大的。这同样制约了这二者之间金融交易关系的发生。加之个私企业本身所存在的规模小,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贷款抵押物等先天不足,更使得国有银行对其授信趋于谨慎和保守。

既存的金融组织无法开展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有效金融服务,从而造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失衡与不适应。在巨大的融资缺口面前,受“潜在利益”的驱使,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社、合作

基金会等创新组织形式随浙江民营经济成分的发展应运而生。例如浙江温州,1984年即诞生了第一家城信社,并且发展速度很快,1992年前全市就创办起43家城信社^①。以填补国有银行金融服务空白形式出现的民营金融机构,带来了效率的帕累托改进,作为一项对个私企业、民营金融机构自身、公众以及地方政府都有利的制度安排,其以巨大的动力兴起和成长自然是合乎情理的。

值得指出的是,浙江的城信社等民营金融机构基本上是按股份制方式组建的,一部分城信社甚至完全由个人和民营企业出资建立,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民营金融企业。例如,浙江温州的一些城信社的资本金就较多地来源于个人,1990年之前全市即有4家社完全由个人入股组成。1988年开始温州的一部分城信社为明晰产权,将一部分历年公积金直接划入股东名下^②。在浙江台州市的三个区中,先后组建了10家城信社,其中6家也是以股份制方式由民间资本入股组成的,包括泰隆城市信用社、银座城市信用社等。如“泰隆社”按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成,资本金完全来自于民营企业 and 自然人,目前共有40位股东。民营金融机构的这种以个人股为主体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强大的激励约束功能,能促使其采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整套组织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制度,比如强调独立自主经营,注重经营业绩的积累,采用较为科学的风险约束机制等,进而使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实现良好的经营绩效。

正因民营金融机构与个私经济在产权设置、运作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能产生一种制度上的天然亲和力,并且城信社等民营金融机构规模小、机制灵活、管理层次少、运行成本较低,比较适合个私企业融资需求的特质,而民营金融机构又扎根基层,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上的信息存量,低成本地了解到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水平,易于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的障碍^{2 [p.5]}。以上这些构成了双方发展业务关系的良好基础,使民营金融机构成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支持个私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金融组织形式。截止至1999年9月,城信社、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的私营企业及个人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的余额占全省金融机构上述贷款总额的69.97%,可见,民营金融业是金融支持个私经济的主力。

浙江经济独特的结构特征与发展中的民营金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融互相支持,取得了极好的联动效应。正是由于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原被梗塞的外源融资渠道得到疏通,其面广、期短、量小、分散的资金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从而摆脱了创业时启动资金匮乏和生产经营规模扩张时内源融资难以满足需要的制约,逐步改变了内源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融资结构。在民营金融业的金融服务和融资供给支持下,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经济渗入领域不断拓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特点。很难想像,民营经济如果没有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因而只能单纯依赖自身的资本积累以“滚雪球”式扩张的条件下,其现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将如何获得。同样,民营金融机构将其业务主要定位于民营企业,也较好地发挥了民营金融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市场占有方式和生存空间。个私经济的加快发展,进一步拓宽民营金融发展的边界,而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民营经济的支持构筑起了两者之间长期密切合作的基础,增强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民营企业运作的高效率也促进了民营金融业的效益改进和稳健发展。

总之,浙江民营金融业的产生、成长是改革后迅速兴起的民营经济为摆脱外部融资的制约而出现的一种自我突破,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而其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内生地引致了民营金融这一制度安排形式的萌生,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民营金融的发展与个私中小企业的兴起相互联系在一起,个私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内在要求民营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①② 参见张震宇等《温州金融现象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民营金融与金融深化

美国经济学家 R·I·麦金农和 E·S·肖在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金融压制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认为通过金融深化可产生积极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与收入效应。放松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促进金融业的竞争即是金融深化策略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浙江民营金融的兴起与壮大无疑对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民营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结构。

现今,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这种多元化格局,只是完成了对原有金融机构体系的外观整合,实质上,单一的国有制金融部门依然“一统天下”^{[3][p.51]}。而在浙江区域经中,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大型的金融机构与众多小型金融机构竞争共存的新局面。金融结构的演变是金融深化的现实要素。民营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多层次、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兴起,必将促使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使金融体系对经济的辐射面、渗透力和适应性日趋强化。

其次,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与效率,改善了金融资源配置。

浙江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规模的扩大,使个私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成分得到了一定的金融服务的配给,为其提供了外源融资的机会,改变了其以往内源融资占支配地位的融资格局,摆脱了经济主体储蓄与投资混淆在一起(即每个个私企业主要想扩大投资必须先进行自我储蓄)的局限。发展中的浙江民营金融业部分实现了对社会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这种重新安排,一方面提高了储蓄的总水平,即通过其灵活的经营机制,有效地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尤其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闲散金融储蓄资源,提高了储蓄率;另一方面则更有效地分配了资金,提高了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民营金融业的产生,参与了原由国有金融部门独占性地完成的并且是十分低效地完成的对稀缺的储蓄资源的配置过程,将一部分资金导向了具有显著效率优势的非国有部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储蓄总量的增长、储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既是反映金融深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金融深化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再次,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发展了市场竞争,促进了国有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

主要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浙江民营金融业的生存和发育,打破了金融业原有的垄断格局,构筑了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给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金融机构施加了强大的外部压力,有力地促进与启动了其向商业化转轨的步伐。随着民营金融的日趋成长,国有金融业被迫参与由前者所带来的强有力的竞争,其行为方式开始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如果没有民营金融的发展对国有金融部门所造成的压力,国有金融的改革往往只会在现存的体制框架内作某些局部的技术性调整,而很难有根本的制度性转换。因为,如让国有金融继续保持垄断经营地位,无任何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则其改进效率和进行机制转换的动力将无从产生。另外,民营金融业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有关成功探索也为国有金融部门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具有值得借鉴性的对策思路。

第四,民营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良好的信用环境的形成,推动了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完善。

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组建而成的民营金融机构,与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个私中小企业)都基本建立在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作机制基础上,它们按照通行的市场交易规则,独立自主、互惠互利地参与融资活动。这种融资活动属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交易,具有较强的融资约束效力,作为融资

主体的个私企业必须独立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由此,浙江民营金融的存在,逐步培养了经济主体的“借债还钱”的信用观念,增强了其风险意识,提高了其金融素质,改善了社会金融秩序。实践表明,欠债有理、欠债有利、逃债废债等恶化信用环境的观念和行为对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健康的信用规则和风气则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可以预期,良好的信用环境将为金融业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将对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

第五,民营金融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了积极的探索作用。

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应反映资本的社会稀缺程度,并能够灵活地调节社会资金的供求。按照金融深化论者的观点,提高货币的实际利率,就可以增加货币需求,增加储蓄与投资,形成一种“渠道效应”。但我国传统的计划利率往往背离现实的资金供求状况,其与市场利率(黑市利率即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利率)严重偏离,使得投资需求对利率缺乏弹性,造成资金的过度需求和使用上的巨大浪费。而浙江的民营金融业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摆脱计划控制的倾向,时常突破国家的利率管制框架,按市场利率进行资金借贷,缩小了利率水平的扭曲程度,带来了积极的储蓄效应和投资效应,为市场均衡利率的形成做了尝试性努力。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民营金融的这种行为加大了自身的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规的。

最后,规范的民营金融业的存在与发展,还抑制了地下金融活动的泛滥,便利了央行监管并提高了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地下金融活动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其逃避中央银行的监管,扰乱正常的金融竞争秩序,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对民营金融业管制的一定的放松,规范化的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成功地排挤了非法金融活动的运行,这一方面有利于充分释放地下金融所蕴含的能量,另一方面也将其纳入了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范围,从而有利于金融秩序的规范。同时,如果地下金融活动大量存在,必然导致大量现金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循环,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控制的难度。通过民营金融的规范化良性发展,则统一的货币政策可以得到有效实施,便利了社会信用总量的合理控制,并引导资金投向结构的优化。

总之,浙江民营金融业的兴起,引致了金融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金融活动方式的更新变化,使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有了更多的投融资机会,有力地推进着浙江当地的金融深化。

四、民营金融成长的制度环境

尽管民营金融业在浙江渐进式推进的市场深化和金融深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突破,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在运行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些制约因素,如,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严厉的金融业务管制措施以及管理层源自意识形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歧视性看法等等。总之,与国有金融机构相比,民营金融业仍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之中。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浙江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支撑。从现实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来看,民营金融业在浙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为民营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1. 加快金融部门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解除对民营金融的压制。

浙江现存的一些完全意义上的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是通过钻政策的空子,以打“擦边球”的方式

组建而成的,从而在现实中一般以“小打小闹”的形式运作,甚至带有一定的制度扭曲和畸形,这是其规模难以“做大”的根本原因。如果允许民间资本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享有国民待遇,为其提供一种规范、开放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将十分有利于浙江民营金融的成长。在此种环境下,民营金融业将获得稳定、明确的制度预期,其原被抑制的金融创新需求将得以充分展示和满足,其所蕴含的巨大市场能量将被有效释放。

目前,浙江的民营金融业尚还局限于单一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今后应创造条件允许和鼓励其向保险、证券、信托等多领域渗透。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适应性,可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事实上,就地方政府而言,其对建立区域性的民营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因此,只要中央政府认识到发展民营金融的积极作用,则在民间资本对民营金融的强烈制度需求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强大合力下,浙江民营金融的发展将会得到加速。

2. 尊重自下而上自发的制度创新,更多地交由市场来决定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

我国各地的经济金融发展很不平衡,表现出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例如浙江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就明显地与其他省份相异。因此,政府在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时,应考虑到各地经济环境的差别性、不宜简单地“一刀切”地强令采取一种制度安排形式,以免造成诸多的不良后果。以前段时期我国开展整顿县(市)城市信用社(要求县城市信用社一律并入农村信用社)为例,应该说,在某些欠发达省份,因缺乏实行商业化运作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县(市)城信社归并农信社,改组为互助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合作金融组织,或许是一种合适的安排。然而,就浙江而言,有着为数众多的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个私中小企业,它们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日益强劲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至今仍未得到完全满足。若将为数不少的优质的县(市)城信社归并到农信社,随着其经营行为、经营对象、产权制度等的改变,将不利于其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更优质、更具效率的金融服务,加剧民营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之间的缺口,最终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不应忽视民营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能力,须从现实条件和客观需求出发,允许制度安排的多样性。

3. 为民营金融机构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例如,建立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增强公众对此类机构的信心,协助民营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帮助提高社会公众对民营金融的信任度等等。在金融业的竞争日趋强化的环境下,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对于民营金融的业务拓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参 考 文 献]

- [1] 史晋川. 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J]. 经济研究, 1997(12).
- [2] 樊纲. 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J]. 上海金融, 2000(9).
- [3] 中国人民银行临沂支行课题组. 民营银行构造及其营运模式研究[J]. 金融研究, 1999(12).

[责任编辑 曾建林]